



陈燮阳指挥乐团演奏。

陈燮阳供图

2025年10月29日夜，成都城市音乐厅，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闭幕式上，86岁的陈燮阳缓步登台，步履沉稳，一如他驾驭过的无数个节拍。当“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音乐）”的奖杯交到他手中时，长时间的掌声，在此刻幻化成无数乐章的交响。

“60年来，我只专注于做好我的专业。党和国家培养了我，让我能做我热爱的事，其实从社会对我的要求来说，我做的还是远远不够。”这位亲历了中国交响乐大半个世纪发展历程的老人，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他的艺术初心。

1939年，陈燮阳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陈蝶衣是词作家，母亲承袭家学，精通书画和戏曲。在这样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中成长，昆曲的悠扬、笛声的清越，几乎贯穿了

每年重阳节，都是上影演员剧团老艺术家们最盼望的日子。重阳敬老，如同一场跨越时光的“家庭团聚”。

2025年的重阳活动格外特殊。两年前，我提出改造院墙的设计，得到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及湖南街道的支持。围墙镶嵌着赵丹、白杨、张瑞芳、孙道临、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7位前辈的艺术铜像。活动当天，剧团门前，我与剧团前辈牛犇、达式常、吴海燕、赵静、王诗槐等电影表演艺术家共同为围墙揭幕。就如2018年剧团重归时一样，剧团老老少少每一张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剧团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们，共同见证了电影在这座城市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上海电影”四个字，带着百年沉甸甸的荣耀和辉煌，许多前辈正是这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的推动者。

在剧团的小院里，我们10年间先后为张瑞芳、赵丹、孙道临、王丹凤落成了铜像。有人问：在单位里放这么多铜像干什么？我回答说，这不仅是铜像，他们是我们创作迷茫时的灯塔，是可以照亮我们心灵的榜样。在演员剧团会议室的墙上，仰角最醒目的位置，可以看到刘琼、上官云珠、白杨、魏鹤龄等前辈们的照片，师者如光，微以致远。你看到周璇和赵丹，就会想到《马路天使》；看到张瑞芳，就会想到《李双双》《南征北战》；看到白杨和上官云珠，就会想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看到仲星火，就会想到《今天我休息》。

剧团创作的脚步没有停止。2016年，剧团老中青三代人集体参与拍摄电影《邹碧华》，同年，剧团还集体参演了话剧《长征：不朽的丰碑》。久违了的集体创作氛围触动了牛犇老师，老人家在83岁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给牛犇写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我们还发起并举办了多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让更多的电影人、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加入公益慈善的行列。

拍摄电影的机会少了，我们就组织演话剧，在录音棚诵读小说。我们请出著名表演艺术家达式常做导演兼台词老师，用2年时间读《牛虻》，用1年时间读《人民的选择》，等于用3年时间让演员们回炉，办了个“台词补习班”。无论是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新疆昆仑山兵团战士驻地，还是上海武警官兵们的军营里，都有上影演员剧团演员们的身影。

我为自己与优秀的前辈们一样从事电影事业感到骄傲，为自己能成为剧团的一员感到幸福。而今天，在唐嫣、李宗翰、陈龙等青年演员身上，我看到了未来的样子。相信这份光影间的温情与传承，将继续在上影演员剧团的小院里、在上海电影的血脉中，久久流淌。

（作者为上影演员剧团团长）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周飞亚

“只要还能站上指挥台，我就会坚持下去”

张珊珊

陈燮阳的整个童年，也为他日后走上音乐道路埋下种子。

5岁时，陈燮阳已能演唱京剧，甚至会在客人来访时主动表演。每当戏班在乡下戏台演出，大人也常把这个爱唱戏的孩子抱上台去唱上一段。这段“初次登台”的经历，透露出他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

而真正改变陈燮阳一生的，是姐姐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的一条消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正在招生。怀揣着对音乐的满腔热爱，少年踏上了赴考之路。考场上，他背着战友赠送的二胡，用《歌唱二郎山》《歌唱井冈山》两首曲目打动了每一位评委。尽管已超龄且错过招生，陈燮阳仍因才华出众被破格录取。看到榜单上的“特1号”，他激动难抑。他后来笑言，是“两座山”助他跨入了音乐殿堂。

1965年，陈燮阳自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命运为他安排了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从原定的上海歌剧院，转而踏入上海舞蹈学校，与正在创排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结缘。他不仅担任《白毛女》的指挥，更与瞿维、吕其明、马友道、陈本洪等先生一同参与了音乐创作和配器工作。

“整整16年，每天跟乐队排练接触，课上学到的东西能够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课堂上没学到的在实践当中自己去理解、去体会，对我的锻炼非常大。”16年的舞剧指挥生涯，不仅磨练出他敏锐的节奏感和应变能力，更让他懂得音乐最终要服务于艺术表现的真谛。这段独特的经历，为他日后驾驭各种音乐体裁奠定了难以替代的坚实基础。

1984年，陈燮阳接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

面对有时“台上演奏员比台下观众还多”的困境，他做出两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引进外籍乐手；创立音乐总监负责制，打破传统“团长负责制”艺术行政一把抓、无法专注于艺术核心事务的局限。改革举措迅速显露成效。音乐总监负责制的管理体系，不仅推动了上海交响乐团的艺术发展，更为国有文艺院团的现代化管理提供了宝贵范本。

“我要用我的一生，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这是陈燮阳毕生的艺术追求。

这一理想，自青年时期就在他心底默默酝酿。1998年，一纸意外的邀请改变了陈燮阳的艺术轨迹，也让这个理想变得格外清晰而坚定。

当时，中央民族乐团急需一位指挥，率团首登古典音乐圣殿维也纳金色大厅。团长俞松林为这场演出定下3个严苛标准：专业指挥、享有声望、精通民乐。曾执棒香港中乐团和台北市立国乐团的陈燮阳成了不二人选。

这是一场被载入史册的演出。当宏大的乐章被奏响，西方观众第一次领略到东方音乐的磅礴气势。整场演出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改编。奥地利著名主持人布拉维教授建议，“请用中国特色的方式演奏。”这个建议让陈燮阳彻夜未眠。最终，他创造性地以板鼓开场，融入小锣和弹拨乐器，再自然过渡到原曲主题。中西合璧的版本大获成功，一位奥地利司机对他们说：“我听了那么多年的‘拉德斯基’，你们这个‘拉德斯基’是最好的。”

音乐会的轰动效应远超预期。最后一曲終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乐团破例返场5首曲目，仍无法满足现场沸腾的观众。热烈氛围让站在指挥台上的陈燮阳“眼泪差点掉下来”。

艺文观察

期待乌镇戏剧节的“长尾效应”

奚牧凉

这场漫长戏剧之旅中被反复叩问、试炼、震撼。

多年以来，乌镇戏剧节引进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剧团与戏剧作品，为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文化交流互鉴的窗口。而以“青年竞演”板块为中心，国内青年戏剧创作者也得以尽展才华。

“青年竞演”板块的戏剧竞赛，12年来固定于一座质朴的水乡建筑——蚌湾剧场内举办，门票免费，观众簇拥在方寸舞台旁，氛围有着家一般的温馨。本届青年竞演的作品又一次展现出百花齐放的面貌，如呼吁关怀老年群体的《家有儿女》、融汇生活感悟与哲学深思的《啊，宇宙之王》，以及“最佳戏剧奖”得主、对戏曲传统程式表演与古代戏剧经典《牡丹亭》加以创新重构的《游园梦梦》，皆从不同角度勾勒出当今青年群体的所感、所思、所。摘得本届青年竞演“特别关注奖”的作品《一块钱》，收获了尤其热烈的好评与共鸣，其剧情改编自创作者的亲身经历，源于他与如今已逝的爷爷之间的动人感情。随着越来越多更新一代观众走入包括乌镇戏剧节在内的戏剧现场，如今的中国戏剧，已经与青年群体的文化兴趣与文化诉求形成了紧密联结。

11天的戏剧节，各种演出令人目不暇接，但它毕竟只能提供一段时空有限的戏剧之旅。对很多戏剧人而言，乌镇戏剧节带来的“长尾效应”更令人期待。在主办方“蜻蜓计划”的扶持下，去年乌镇戏剧节中脱颖而出3部青年竞演作品，今年已经开启了在北京、上海的商业演出。而在本届“起跑戏剧”板块以剧本朗读形式亮相后，英国剧作家凯瑟琳·莫尔编剧的《农庄客人》，也将于今年12月正式首演。

乌镇戏剧节正在从一年一会的水乡汇聚，发展成为辐射广远的戏剧光源，为行业注入更澎湃的创作活力、更强劲的产业能量。期待在未来，它能与中国戏剧一直携手向前。

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古镇嘉年华板块演出剧照。

乌镇戏剧节组委会供图



纪录片《白马姐妹》海报。

张同道供图

《白马姐妹》与其说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一个跨越24年的纪实长镜头。本片采用跟踪拍摄方法，用细节记录了白马藏族山寨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洪水之后的重建。漫长的拍摄积累了浩瀚素材，后期剪辑持续了一年。最终，我们将故事聚焦四姐妹，呈现她们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故事。遥想1999年春节前夕，我们从四川成都一路向西北进发，在绵阳平武县大山里第一次遇见白马藏族。当厄哩寨篝火燃起，男男女女跳起圆舞，四姐妹并排走来，一身鲜艳靓丽的长裙，花腰带约束着苗条的身材，仿佛轻盈的格桑花。我们的摄影机很快聚焦四姐妹。

白马藏族最大的节日是春节。除夕

快人快语

并非每部茅奖小说都适合舞台

赵建新

当下剧坛，改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方兴未艾。据统计，自茅盾文学奖于1981年设立以来，40多年间11届茅奖共有50余部长篇小说获奖。除了第一届和第七届获奖小说没有被改编之外，其他九届有近20部获奖作品先后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其中不乏像《推拿》《主角》这样的大IP，曾被改编成话剧、戏曲多个版本。尤其是近年来的第十届茅奖，获奖的5部小说中3部都被改编成戏剧，可见茅奖小说对戏剧界的吸引力。

茅奖小说的文化含量和艺术价值，使其拥有一般小说所不具备的魅力，为改编作品提供了良好的文学基础，这是戏剧界青睐茅奖小说的主要原因。11月4日，第十八届文华奖获奖名单公布，获得剧目奖的话剧《北上》、歌剧《尘埃落定》即改编自茅奖小说。

此外，茅奖这块金字招牌，也使改编作品天然拥有较高的知名度，更容易赢得观众的注意。

但也应看到，小说和戏剧两种艺术形式在叙事上具有本质区别，并非每部茅奖小说都适合被搬上舞台。

正如狄德罗在《论戏剧诗》中所说，所有的好戏都能改成好小说，但并不是所有的好小说都能改成好戏，区别在于它们的艺术规律不同。究其根本，就在于小说家有的是时间和空间，完全可以凭借文字上天入地，挥洒自如；而戏剧家却要在两三个小时的舞台时空内讲完故事，没有对时间和空间的高度浓缩和掌控，实在勉为其难。所谓“舞台艺术是戴着脚镣跳舞”，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一般而言，茅奖小说多以史诗性见长，时空跨度大，叙述线索多，更增加了舞台改编难度。长篇小说要实现史诗品格，势必要通过环境、人物关系和情节的逐步演变推动故事发展。如《白鹿原》以白、鹿两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思想展示革命洪流中乡土社会传统伦理的崩溃和制度变迁；《尘埃落定》以“傻子”的视角见证康巴藏族土司制度的兴衰；《主角》以秦腔名伶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际遇、起废沉浮，反映在社会变革洪流中一个艺人与一门民间艺术之间的复杂关联；《北上》更是以三纵四横的网状时空结构和100多年的社会图景，力图揭示“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因叙事结构复杂、时空变化自由，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为“渐变的艺术”；而舞台剧结构相对单纯，时空范围相对集中，很多时候需要“突转”和“发现”，所以才有“突变的艺术”之称。

从一部长篇小说到一台戏，如果不能娴熟掌握“渐变”到“突变”的规律，不能做到把小说彻底打破了重新“化”于舞台之上，就会让改编成为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目前看来，在众多茅奖小说的舞台改编中，对那些体量小、篇幅短的原著的改编相对成功；而影视剧改编的成功率要高于舞台剧，也和影视剧篇幅长、艺术表达手段多有密切关系。

当然，并不是说某一类小说就是绝对的“改编禁区”。事实上，随着剧场观念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加持，舞台的表现力得到很大拓展，戏剧在舞台呈现上和小说之间的距离已越来越小。但创作者仍需对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本质差别有清晰的认知，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进行更多的艺术探索、更高难度的创新挑战，才能真正推动戏剧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用跨越24年的镜头记录白马姐妹

张同道

夜，全村人聚在晒谷场唱歌跳舞。从初一开始，几乎每天晚上，寨子里的年轻姑娘都围坐在四姐妹家的火塘边，一边唱着白马歌，一边喝着咂酒。白马藏族歌曲大多歌唱劳动场景，也有情歌，时而清丽明快，时而舒缓悠长。夜色渐深，姑娘们站起来，边唱边跳，中间伴随着清脆甜美的笑声。白马藏族有语言，没文字，历史传说、民间风俗都以歌声口口相传。这些乡村女子识字不多，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人。

当时，大姐伍音早24岁，刚刚盖起自己的房子，幻想远走他乡；三姐小英美17岁，一心想去九寨沟跳舞；四姐金银早13岁，梦想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只有22岁的二姐晓小愿意踏踏实实留在寨子里。

第二年夏天，我再次赶到厄哩寨。一层薄雾笼罩着夺博河，绿色草树装点着两岸山坡。二姐从河对岸背回一竹篓南瓜，告诉我，她家被选为白马民风民情接待点。不久，几辆汽车驶来，一队游客走出，在寨子里游荡。四姐妹忙碌起来，大姐烙饼，二姐炒菜，三姐和面，四姐端盘子，待游客坐定，她们一起唱起敬酒歌。人美、歌美、景好，四姐妹的名声很快传到远方，绵阳、成都的游客络绎不绝。那个夏天，我的摄影机见证了四姐妹忙碌的身影，也见证了她们的歌舞如何迷醉远来的游客。

一别18年，再次相见，四姐妹已人到中年。洪灾过后，家园破碎，淤泥遍地。大姐夫是村支书，一天到晚忙寨子重建，家里的事都留给大姐，搥地板、装烟囱、修厨房、刷门窗，甚至帮着邻居抬房子。好在有二姐在帮忙帮忙。三姐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孩子上学了，她做完卫生，拿起眉笔，细细化妆——镜头切回20年前，17岁的三姐正在修饰眉眼。摄影机见证了一位女性从17岁到37岁的成长，她收起个人梦想，担起家庭责任，不变的是一颗爱美之心。四姐到九寨沟山里开了家餐厅，从早忙到晚，偶尔回到厄哩寨，寻找童年家园。

出现在电影里的当然不只有四姐妹一家，还有敢爱敢恨的胖胖子，在一片废墟中开垦土地，种植蔬菜；一直住在寨子里，采药、打草的熊花；还有养蜂的奶奶，搬房的表妹……这些有名无名的人物，构成了白马女性群像。《白马姐妹》记录了20多年来大山深处的白马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沧桑巨变，当然，这不仅仅是白马的进步，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幅侧影。

（作者为纪录片《白马姐妹》导演）

创作谈